

<<张居正大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张居正大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6368009

10位ISBN编号：7546368006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作者：朱东润

页数：26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张居正大传>>

前言

二十余年以前，读到鲍斯威尔的《约翰逊博士传》，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，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，作切实的研讨，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。

在那一年，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，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，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。

宗旨既经决定，开始研读。

除了中国作品以外，对于西方文学，在传记作品方面，我从勃路泰格的《名人传》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，在传记理论方面，我从提阿梵特斯的《人格论》读到莫洛亚的《传记综论》。

当然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，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。

在这几年以内，陆续写成的《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》、《传记文学之前途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》、《传记文学与人格》和其他几篇文章发表了，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。

除了散篇以外，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，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，只能写定一些纲领，未能完成；完成的只有《八代传记文学述论》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。

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，总算勉强有些认识，但是认识过去，当然不是开导将来。

佛家所谓“阅尽他宝，终非己分”，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。

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，专靠称扬古人，叙述古籍，其结果只落得“阅尽他宝”，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。

一般文学如此，传记文学也是如此。

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。

这是一个尝试，成功固然很好，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，实际也是一种成功。

自己对于失败，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，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！

写作的目标决定，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。

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，文学是整个的，在近代的中国，传记文学的意识，也许不免落后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、不容落伍的一日。

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，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，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，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，乃至比较好的作品，如朱熹《张魏公行状》，黄榦《朱子行状》的时代也过去了。

横在我们面前的，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。

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，要认识，要了解，要欣赏；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。

古人支配今人，纵使有人主张，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、不能想象的谬论。

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，起了不少的变化，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，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？

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。

一部《约翰逊博士传》成为家喻户晓的文章。

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，和他的许多朋友，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，讨论政治，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。

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，捧腹大笑，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。

约翰逊笑也有，骂也有，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，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，蹑手蹑脚，更引起哄堂的狂欢。

这是生活，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。

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，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，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。

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，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。

另外一种斯特拉哲的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。

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，打开“现代传记文学”的局面。

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，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。

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，看到她的保姆，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。

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，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这里有英国的政局，也有世界的大势。

但是一切只在这部薄薄的小书里面。

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，没有繁琐的考订。

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，我们不妨说《女王传》很有《史记》那几篇名著的丰神。

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，其实不是偶然的事。

但是1943年的中国，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。

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，一部《格兰斯顿传》便是数十万字，一部《狄士莱里传》便是一百几十万字，他们的基础坚固，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，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。

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，探赜钩玄，当然立刻使入耳目一新，夺取特有的地位。

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。

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，但是我的愚见，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，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。

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，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、似小说不是小说，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。

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，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，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。

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，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？

仲弓说过：“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”

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太简乎？”

朱熹《集注》：“言自处以敬，则中有主而自治严，如是而行简以临民，则事不烦而民不扰，所以为可；若先自处以简，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，而所行又简，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？”

这是说的政治，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，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，不能谈到简易；本来已经简易了，再提倡简易，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？”

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，但是1943年的中国，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。

那么惟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。

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，常常是那样地繁琐和冗长，但是一切都有来历，有证据。

笨重确是有些笨重，然而这是磐石，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，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。

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，不是它的笨重，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。

在这两点，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，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。

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，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，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，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，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，而丧失文学的价值。

这个议论，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，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，便丧失本身的价值，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。

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，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、有证据、不忌繁琐、不事颂扬的作品。

至于取材有抉择，持论能中肯，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。

在作者着手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，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，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。

孟子说过：“智譬则巧也，圣譬则力也，由射于百步之外也，其至尔力也，其中非尔力也。”

力的方面，我们应当努力；巧的方面，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。

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，便得确定一个传主。

我曾经说过：“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，自己的一生。”

这一生的记载，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。

所以在下州小邑、穷乡僻壤中，田夫野老、痴儿怨女的生活，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。

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，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。

一个平常的人物，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，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，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，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，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，感到深切的同情，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都有独特的价值。

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，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，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，在这方面，实际便无从着手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在西方文学里面，平常人物的传记，还是非常地寥落，这是一个理由。

因此，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。

1941年的秋天，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。

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，但是在着手的时候，许多困难来了。

有的人伟大了，但是他的伟大的场所不一定为我所了解。

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，但是资料方面，不是少到无从探取，便是多到无从收拾。

抗战期间的图书馆，内部的损失和空虚，是尽人皆知的事实；抗战期间的书生，生活的艰苦和困乏，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

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，更有许多顾虑。

其次，在下笔的时候，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。

传主的时代太远了，我们对于他的生活，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；太近了，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，对于他的一生，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。

那一个秋天，我因为传主的选择，经过不少的痛苦。

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。

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，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，实在数不上几个。

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，这整整的十年，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，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。

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，整个的政局是混乱，以后数十年，还是混乱：只有在这十年之中，比较清明的时代，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，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，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。

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，其故在此。

但是居正的一生，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。

“誉之者或过其实，毁之者或失其真”，是一句切实的批评。

最善意的评论，比居正为伊、周，最恶意的评论，比居正为温、莽。

有的推为圣人，有的甚至斥为禽兽。

其实居正既非伊、周，亦非温、莽：他固然不是禽兽，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。

他只是张居正，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。

但是，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。

第一，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。

现代传记文学，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。

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，可以使文字生动，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，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。

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，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；明代人笔记里面，也许有一些记载，我们为慎重起见，不敢轻易采用，这一个缺憾，几于无法弥补。

第二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，只有政治；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，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，不能不加以叙述。

繁重、琐屑，都是必然的结果，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。

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，寥寥数百字，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，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？

不过，任何一篇史传，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，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，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，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。

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。

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，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，他们便有些茫然。

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；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，不是一件罕见的事。

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“好古”的精神。

因为好古，所以不知现代，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。

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，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、余子俊、翁万达、杨博等所筑的边墙；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，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、万恭、李化龙、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。

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，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，发生一种隔阂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说少了，他们不会明白；说多了，他们会嫌烦渎：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。

这许多困难的后面，还有一个难题，便是材料的缺乏。

《明史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明纪》、《明史稿》、《明会典》这一类常见的书籍，固然可以到手；但是重要的材料如《明实录》，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，除了间见征引以外，竟无从利用，不能不算是件遗憾的事。

主要的史料仍是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四十六卷。

以本人的著作，为本人的史料，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。

一个人的作品，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，对于自己的记载，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。

关于这一点，当然还有一些限制：年龄高大，对于早年的回忆，印象不免模糊；事业完成，对于最初的动机，解释不免迁就。

对于事的认识，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；对于人的评判，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。

人类只是平凡的，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，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，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踌躇矛盾之中，发现事态的真相。

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，其故在此。

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四十六卷的母本，是明刻《太岳集》，卷数同。

在这四十六卷之中，共奏疏十三卷，书牒十五卷，文集十一卷，诗六卷，《女诫直解》一卷。

除《女诫直解》以外，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，当然是最好的史料。

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。

居正进白莲、白燕颂，见《明史》，今集中有《白燕曲》而无《白莲颂》。

居正为高拱墓铭，见书牒卷十四《答司马曹傅川书》，今不见文集。

居正有《请令天下度田疏》，略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今不见奏疏。

张嗣修《编次先公文集凡例》言：“先公文集，在旧记室所者，自嗣修等逢难，十余年后，始得完归，存者十八，逸者十二；如少年所作诸赋，全逸；应制诗，敕撰文，逸十之二；仅据存者编次之，凡为诗六卷，为文十四卷，为书牒十五卷，为奏对十一卷，合之则为全集，离之亦可四种。

”所谓“存者十八，逸者十二”，大致是一句遁词。

余懋学曾为居正进《白莲颂》，提出弹劾；神宗曾斥居正“假以丈量遮饰，骚动海内”；《白莲颂》和《请令天下度田疏》未经收入，大致是有意的删除，不是无意的逸失。

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，当然只是嗣修、懋修的偏见。

韩愈论张巡、许远的后裔，斥为“两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”。

大致嗣修、懋修恰是“不能通知二父志”的一类。

这四种著作的编次，也不一律。

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，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，偏偏嗣修等要分类，尤其是诗集、文集，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，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，而推定的结果，只是一种假定，不是确定，所以史料的价值，不免受到影响。

幸亏奏疏、书牒的篇次，大体是编年的，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，但是编年之中，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。

奏疏十三卷之中，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，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。

书牒十五卷，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；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，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、高二人有关的书牒；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，与王世贞、世懋兄弟书，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，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。

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。

最诧异的是书牒诸篇的标题。

嗣修自言：“先公书牒，自旧记室所携来，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，而手泽完归，考其年月，似裁答俱无恙也。

或有举其官，缺其号，或有举其号，缺其官，或官号俱备，或直举其讳，凡例不定。

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，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”嗣修认为书牘标题，出于居正口授。

其实这是一句遁辞。

书牘十三有《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》，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；有《答蓟辽总督张崐崐书》，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，及居正死后，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。

诸如此类，可举者尚多。

一切看出书牘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，但是标题方面，还是非常凌乱；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，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，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，或出于嗣修、懋修之手，则不可考。

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牘而论，所谓“编年”，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，并没有注明某疏、某书作于某年某月，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，编年的作用，实际还不能充分，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。

不过比诗集、文集要每卷、每篇单独推求的，已经便利了许多。

要为居正作传，眼前所有的材料，只有这一点点。

倘使看到《明实录》，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，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；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，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，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。

但是没有办法，一切的空论，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。

我感到彷徨了，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，但是还有一些眷恋，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。

这是为的什么？

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，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，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。

蒙尼辨耐的《狄士莱里传》写成六大厚册，一百五十万言，在材料方面，可称毫发无憾，但是莫洛亚的《狄士莱里传》继此出版，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。

华盛顿早年的日记，直到最近方始发现，关于他早年的恋人，还无从确定名姓，但是华盛顿的传记，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，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。

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

”大家知道有一个“至善”，也知道这个“至善”是无法完成的，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“至善”的努力。

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，未免朦胧一点，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，人物不能不算伟大，只要传记文学的风气一开，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，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。

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，替大家做一个前驱，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。

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。

我写《读诗四论》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，用的文言，因为这许多书中，充满文言的引证，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，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。

但是在写的时候，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，必需运用新的笔调，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。

后来写《八代传记文学述论》，用的语体，便是这个理由。

用语体写的时候，也有两种困难。

第一，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，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。

其次，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，因此在叙述的时候，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。

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，不过最近数年以来，这样的写法，已经成为风气，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，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，也就觉得无可非议。

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

”也许二十年以后，又有一种变化，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。

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。

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，有了对话，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。

一篇《项羽本纪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

秦始皇帝游会稽，渡浙江，项羽和项梁往观，项羽说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

”项梁掩其口曰：“无妄言，族矣！”

”这是两个人的对话。

项羽要杀宋义，他说：“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！”

<<张居正大传>>

今岁饥民贫，士卒食芋菽，军无见粮，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，因赵食，与赵并力攻秦，乃曰：‘承其敝！’

‘夫以秦之强，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赵，赵举而秦强，何敝之承！’

且国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，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，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，非社稷之臣！

”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。

其后鸿门之宴，项羽、范增、项庄、沛公、张良、樊哙，都有说话，文字非常生动，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，项羽按剑说：“客何为者？”

”这是问樊哙的，偏偏樊哙不答，张良说道：“沛公之驂乘樊哙者也。”

”项王才说“壮士，赐之卮酒”，这又是吩咐侍从了。

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，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。

这个写法，在小说家手里，成为最好的工具。

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。

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，同时也是史。

因为传记文学是史，所以在记载方面，应当追求真相，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，绝不相同。

这一点没有看清，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；文字也许生动一些，但是出的代价太大，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。

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只要有根据的对话，我是充分利用的，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。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。

从前人记对话，往往不用活的言语，而用死的文字。

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，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：阶固已豫知，姑问稿安在，吏出怀中以进，阅毕曰：“法家断案良佳。”

”延入内庭，屏左右语曰：“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，生乎？”

”曰：“死不足赎。”

”“然则，此案将杀之乎，生之乎？”

”曰：“用杨、沈正欲抵死。”

”徐阶曰：“别自有说。”

杨、沈事诚犯天下公恶，然杨以计中上所讳，取特旨，沈暗入招中，取泛旨。

上英明，岂肯自引为过？

一入览，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，必震怒，在事者皆不免，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。

”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。

明白一点说，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，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。

这一类翻译的方法，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。

尧典：“帝曰：‘畴咨若时登庸？’

’放齐曰：‘胤子朱，启明。’

’帝曰：‘吁，嚚讼，可乎？’

’帝曰：‘畴咨若予采？’

’欢兜曰：‘都，共工方鸠僝工。’

’帝曰：‘吁，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。’

’”这是一段诘屈聱牙的文章。

太史公《五帝本纪》便完全改过了，我们看到：“尧曰：‘谁可顺此事？’

’放齐曰：‘嗣子丹朱开明。’

’尧曰：‘吁，顽凶，不用。’

’尧又曰：‘谁可者？’

’欢兜曰：‘共工，旁聚布功，可用。’

’尧曰：‘共工善言，其用僻，似恭漫天，不可。’

’”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功夫，文字便非常地通畅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，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的文言，翻回白话，一定不会感到诧异。

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，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。

我们对于明代人的说话，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，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，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，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。

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，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的大概。

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的说话。

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，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。

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？

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，平时也是称“孤”道“寡”吗？

从我所见到的，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。

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：“说与皇帝知道，尔婚礼将成，我当还本宫，凡尔动静食息，俱不得如前时间闻见训教，为此忧思。

”神宗自己也说过：“我一时昏迷，以致有错，尔等就该力谏乃可。

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，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，我今改过，奸邪已去。

”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，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的大概，在叙述对话的时候，也有一个根据。

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，如《谢召见疏》、《召辞纪事》、《召见纪事》、《召见平台纪事》、《送起居馆讲记事》、《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》。

在记载的当中，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，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，即如《谢召见疏》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，神宗说：“先生为父皇陵寝，辛苦受热，”又说；“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。

”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，讲学亲贤，爱民节用，神宗答称：“先生说的是。

”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，节饮食，神宗说：“知道了。

与先生酒饭吃。

”在这许多地方，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，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。

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，有时虽写成文言，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，而在说话之中，为求语言的简练，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。

授课的时候，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，以便学生笔记，正是平常习见的事，何况奏对之时，更觉“天颜”咫尺，不许冗长烦琐呢？

这本书的大体计划，是在1941年决定的。

次年春间，写成《八代传记文学述论》。

今年春间，重行写定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，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、第五种。

在这几年之中，一切剩余的时间，都消耗在这本书上，实际着笔是从今年1月3日开始，8月6日终了，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。

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，感觉一点诧异。

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，委实是一个创举。

“大传”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；尚书有《尚书大传》，礼记也有大传；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。

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，发源于经学，一百三十篇的《史记》，只是模仿《春秋》的作品：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，七十列传模仿公羊、穀梁。

“传”的原义，有注的意思，所以《释名·释典艺》云：“传，传也，以传示后人也。

”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，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，加以应有的注释。

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，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“大传”，似乎也不算是破例。

几年以来的心力，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，自己的学力，仅仅达到这个阶段，原是无可如何的事。

我的希望，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，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，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我只打开园门，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，以后游览的人多了，栽培花木的也有，修拾园亭的也有，只要园地逐日繁荣，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，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。

《法显行传》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：“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，遇则皆死，无一全者。

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。

遍望极目，欲求度处，则莫知所拟，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。

”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的足迹，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。

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，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。

无论成功或失败，现在的努力，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。

我应当趁这个机会，对于远方的两个人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二十余年的生活，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。

我独自漂流异地，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。

对日作战以后，我从越南入国，绕到抗战的大后方，从此没有看到故里。

家事的处分，儿女的教养，以及环境的应付，一向我不过问，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。

我没有听到抱怨，也没有听到居功。

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，地方的情形更坏，斗大的一个县城，充满最复杂的事态，天涯游子的家属，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。

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，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。

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，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，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。

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，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。

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，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。

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。

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，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；之后，在同事十余年之中，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，乐山的暮钟。

在我们同事的中间，他的著作，我都曾经看过；我的作品，也没有一本不经过他的商订。

这本书写成的时候，他不及看到，但是最初的计划，曾经和他讨论。

从他那里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，不少的协助；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，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。

现在我得告诉他，万里波涛的重洋，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。

努力啊，我愿有更好的成就，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。

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1943年8月6日

<<张居正大传>>

内容概要

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。他生于平民之家，经过不懈努力，最终成为万历首辅，在明帝国危亡之际力挽狂澜，不过庸庸同僚的反对，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然而，他逝世之后，立刻遭到政敌攻击，家破人亡。《张居正大传》客观描述了张居正的一生，既肯定了他的成绩，也点出了他的过失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作者简介

朱东润(1896-1988)，江苏泰兴人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人之一，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。

朱东润先生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，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料的分析，著有《张居正大传》《陆游传》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《中国历史文学作品集》《梅尧臣传》等，其中，《张居正大传》是中国传记文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“荆州张秀才”
-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
- 第三章 休假三年
-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
-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(上)
-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(下)
- 第七章 大政变
-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(上)
-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(下)
-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
-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
-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
-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
- 第十四章 尾声

<<张居正大传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插图：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，裕王载堉即位，这是后来的穆宗。

他即位的时候，年三十岁。

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。

他崇信道教，从事斋醮，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去他是君主。

杨廷和、杨一清、张孚敬、夏言、严嵩、徐阶——这一群有名的首辅，固然曾经掌握政权，但是威柄，依然在世宗手里。

穆宗和他的父亲不同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。

世宗在位的时候，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，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。

世宗逝世了，他自己做君主，但是君主的威权，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。

朝会的时候，他照例是不发一言。

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。

起初还不妨说是“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”，但是一直到第四年，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。

这确有些骇人了。

当然，穆宗不是白痴，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厌倦。

在宫庭里面，他有他的爱和憎。

他爱女人，爱喝酒，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，爱鳌山，爱宫苑，爱秋千，爱龙凤舰，爱金匱玉盆：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，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。

事实上，实际的政治，用不到他自己操心。

他有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，这些干练的政治家；他也有李春芳、陈以勤、郭朴，这些忠讷的大臣。

政权交给他们好了，穆宗自己想。

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，也一齐放手，因此穆宗一朝，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。

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，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。

他即位的初年，诏令户部购买珠宝，户部尚书马森执奏，不听；给事中、御史们进谏，不听。

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，他上疏说：“陛下玩好之端渐启，弼违之谏恶闻，群小乘隙，百方诱惑，害有不可胜言者。”

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，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。

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，皇后迁居别宫，慢慢地郁出病来，仰庇又上疏，在世宗的时候，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，穆宗只批着，“后无子多病，移居别宫，聊自适以冀却疾。”

尔何知内庭事，顾妄言！

在明代，这真是难得了，一切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，然而宽厚的君主。

穆宗即位的时候，内阁大学士是徐阶、李春芳、郭朴、高拱四人。

徐阶是首辅，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。

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，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。

开了新年，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，进礼部右侍郎，兼翰林院学士。

侍郎是正三品，这已是进官了，但是只是一个阶梯。

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。

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房师陈以勤。

二人入阁，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。

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，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，“凤毛丛劲节，只上尽头竿”。

努力，努力！

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，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，但是他还得努力，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。

奉诏入阁以后，他有《辞免恩命疏》，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，当然地，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。

（附录十三）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，到了中叶以后，演成会推的制度。

《明会典》：“阁臣，吏、兵二部尚书，会大九卿、五品以上官及科、道，廷推上二人，或再上三、四人，皆请自上裁。”

<<张居正大传>>

”就是指的此事。

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的意味了。

不过名为会推，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，其余的只有承认，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的赞同。

万历以来，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，廷推只是一个形式。

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，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，一切的决定，还是由一二人主持。

所以大体方面，本来有不少的类似。

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，还有特简。

任用大臣的时候，会推和特简，是两种选用的方式。

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，甚至拒绝皇上的荣命。

干练的君主，用人行政的时候，甚至大都出于特简。

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，特简的大权依然存在，但是简用的大臣，不是出于首辅的推荐，便是出于近幸的引进。

居正这次入阁，全是徐阶的力量。

入阁以后，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。

无疑地，居正是热恋政权的。

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，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，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，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的政权，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的政权。

政权在手中了，他要有一番作为。

隆庆元年，他还只是一个新进，阁中充满他的老师和前辈，只有李春芳是他的同年，但是在他入阁以前，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。

可是居正既经入阁，便有一番抱负。

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，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，现在事情不同了，一切都看在他的眼里。

隆庆元年四月，居正进礼部尚书，兼武英殿大学士。

据《文忠公行实》，这次进官，因为“永乐大典成”的原故，当然这是指重修《永乐大典》的故事。

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。

隆庆初年的内阁，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——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。

居正和徐阶、高拱，都有相当的关系，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，但是徐阶、高拱的对立，正在逐日地尖锐。

第一个攻击高拱的，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。

世宗病重的时候，高拱从直庐里，偷偷地回去，准备搬家。

应嘉知道了，提出弹劾，世宗在昏眩的当中，一切不问，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，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，事态便扩大了。

高拱有仇必报，本来谈不上容忍，一切正在等待机会。

隆庆元年，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。

京察是明代的制度，宪宗成化四年奏准，京官五品以下，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。

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，每六年一次举行。

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，但是万历以前，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，这便是所谓“闰察”。

本来明朝的文官制度，是终身制，像那些“改组”、“裁员”，以及“手谕”开除这一类的制度，都还没有发明。

在大臣手里的威柄，只是“京察”。

这个威柄，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，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，不受任何的干涉。

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，这一次的京察，连御史、给事中都降黜了，算得雷厉风行。

偏偏杨博的同乡，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。

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。

第一个攻击杨博的，又是胡应嘉。

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，庇乡里，错是没有说错，可是恰恰错在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。

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，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，事前没有提出异议，事后偏要提出弹劾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，下令内阁商量处罚。

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。

内阁当中，郭朴和高拱同乡，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。

他毅然地说：“胡应嘉出尔反尔，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，应当革职。

”“应当革职为民。

”高拱也说。

徐阶看了郭朴，再看高拱，两位阁老都紧张得了不得，没奈何，只得点点头。

胡应嘉的革职，算是革定了。

明朝的言官，真是了不得。

他们是一窝胡蜂，你动了一个，他们会来一群。

都察院有的是御史，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，你瞧罢！

京察的时候，吏部尚书对于言官，照例谈不到降黜。

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，偏偏郭朴、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，胡蜂窝惊动了，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“奸险横恶，无异蔡京”。

给事中辛自修、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，御史郝杰直攻高拱“无宰辅器”。

事态更加严重了。

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。

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，处分减轻了，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。

欧阳一敬再劾高拱“威制朝绅，专柄擅国，亟宜罢”。

高拱当然不能承认，便来一次答辩。

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。

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，一边斥责言官：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。

可是高拱没有满意。

高拱希望徐阶拟旨，给言官们一次廷杖。

杖，杖，杖！

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，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，通常是一次廷杖，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，杖一下，算什么？

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；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，自己也不是严嵩，至于为了高拱，再和言官们结怨，那更犯不着；他再三考虑，只是摇摇头。

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，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。

“你手下有言官，”高拱想，“我手下也有一两个”。

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。

在应嘉事后不久，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。

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，大众聚齐了，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。

一敬劾齐康，齐康也劾一敬。

“你说我是高党，我便说你是徐党。

”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，弹劾，弹劾！

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，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。

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。

但是最后的一枝箭，却从南京放过来。

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，在京察的时候，得到贬黜处分的，连皇帝也留不得，神宗万历以后，偶然还留几个，这真是偶然了。

隆庆以前，京察是无上的威权，五品以下的官吏，一经“察典”，便是终身的耻辱。

这是“上剋下”。

但是明朝的制度，一切都有个平衡，有了“上剋下”，当然便有“下剋上”。

四品以上的官，是京察管不了的，他们在京察这一年，每人照例“遵诏自陈”。

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，听候皇帝的处分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当然这是一种形式，自己不妨来一个“学疏才浅”，用不到直抉隐微，自行攻击。但是给事中、御史们，可以提出“京察拾遗”；经过“京察拾遗”的，没有幸免的机会。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，因为要顾全身分，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。拾遗的责任，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。

就在隆庆元年五月，高拱致仕。

高拱去了以后，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，到九月间，郭朴也致仕。

这一次阁潮里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，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，在左右为难的当中，总算没有得罪老师，也没有得罪朋友，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他认为“士习人情，渐落晚宋窠臼”，正在计较怎样地给他们一个处分。

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，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，穆宗感觉厌倦，吩咐徐阶惩诫，徐阶只是传谕言官，自行省改，事情又平息下去了。

这样度过隆庆元年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君子处其实，不处其华；治其内，不治其外。
事无全利，亦无全害，人有所长，亦有所短。
惧则思，思则通微；惧则慎，慎则不败。
听其言而观其行，观其色而究其实。
天下之事，虑之贵详，行之贵力，谋在于众，断之在独。
——张居正

<<张居正大传>>

编辑推荐

《张居正大传》编辑推荐：他少年步入仕途，中年才得以施展抱负；他大力惩贪，打击特权，改革税制，缩小贫富差距；他生前功劳盖世，死后却家破人亡；他周旋官场一生，却毫发无损；他以一己之力将明帝国的灭亡向后推迟七十多年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